

20世纪以来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徐秋平

(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0)

摘要:世纪之交,人类面临种种危机:流行疾病、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等。各种现代化危机的产生,在20世纪后期引发了遍及世界的“文化寻根”热。作为邻国的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寻根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提出“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云南”的假说。随后,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彝族说”为其中关注的焦点。日本的文化寻根原本是为“日本人论”寻找源流,在此背景下,出现诸多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成果。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为中心进行特征分析,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突破传统文本,通过影像志方法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将是未来的新趋势。

关键词:全球化;跨文化;文化寻根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9)04-0023-04

A Cross-cultur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ic Yi People and Japanese since 20th Century

XU Qiu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200, China)

Abstract: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human beings are confronted with huge crises, which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have brought about a worldwide fever of 'root-seeking' literature. The neighboring Japan began a new phase of cultural 'seeking-root' in China. In late 1970s, a Japanese scholar hypothesized that "Japanese were originated" in China's Yunnan province, and in the 1980s and 90s, a 'hypothesis of ethnic Yi origin' had focused researchers' attention. Japanese cultural root-seeking was previously an endeavor to look for the origin of 'Japanese Nationality'; against such a backdrop, a host of ethnic Yi and Japanese cross-cultural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obtained. Through characteristic analyses of the cross-cultur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ic Yi and Japanese people, we propose that, in the setting of globalization, a cross-cultural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through image-recording method beyond traditional text records would become a future trend.

Keywords: cultural relativism; ethnic Yi people; funeral culture

21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构建了纷彩纷呈、形态各异的世界文化。“多边互动的全球化”之多元主体,既有主权国家,也有相邻国家组合的地理文化区域。美国学者戴维·伊格内修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形容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平面,而是由山河和民族情绪组成的‘搓板’”。^[1]所谓山河,即自然地理环境,民族情绪则属于文化范畴。不同地理条件,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宗教信仰。跨文化比较方法的研究,探寻文化本质的普遍性和文化多样性,是一种参照“他者”过程中对“自我”的重新审视。关于少数民族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日本学者关于彝族文化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日本一批文化人类学者兴起了“文化寻根”活动,诸多人类学民族学者将中国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作为田野调查和研究的重点对象^[2]。随后瑶族、苗族、蒙古族都进入日本文化寻根的活动。日本人的文化寻根研究源流已久。在诸多的文化寻根活动中,日本先后将眼光放在本土,先后有阿依奴人说、原日本人说、日本民族纯血论等,后将关注点放到世界,如西伯利亚说、云南人说、混血人种说等,原本其出发点是为日本人的起源寻找根据。日本关于彝族的研究,前期主要集中于人种溯源,在后期过程中,随着文化寻根活动的

不断深入,日本人将研究焦点转移到了文化以及宗教信仰。

在诸多外国学者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中,日本学者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资料极为丰富。鸟居龙藏、白鸟芳郎、藤泽义美、鸟越宪三郎、伊藤清司、君岛久子、欠端实、波照间永吉等学者对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其中很多成果都与彝族相关。研究主题涉及彝族体质、语言文字、民风民俗、社会制度、历史、神话传说、宗教信仰、节日文化等,主题广泛,研究数量庞大,为彝学研究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资料,同时为彝族文化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

日本民俗学学者佐野贤治,是国际彝学会的成员之一,他不仅负责了日本《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百科》一书中彝族历史文化的编写,而且是较早对彝族民俗宗教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他指出:“民俗学的领域中,祖先崇拜、生死观,彼岸的世界是重要的研究对象。”祖先崇拜的研究,正是通过理解民族的生死观、现世观与心理过程的探索。伊藤清司则主要关注神话和民间传说的视角,发表有《云南彝族的虎节及民间故事》《中国云贵高原的田游》,此外还有伊藤清司在云南开展的彝族“撮泰吉”祭祀的考察报告,将其与日本来访神与农耕祭祀进行比较研究;此外还将日本神话与彝族纳西族等神话进行了比较分析,代表作品有《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中国日本民间文学比较研究》《故事传说的谱系——东亚的民间故事比较》《眼睛的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研究》等等,以上都是将彝族的神话、传说或者民俗与日本对应的部分进行比较,侧重于相似点的分析。星野紘则将彝族傩戏文化与日本假面神来访习俗进行比较——《中国彝族与日本的来访神》,分析两者之间的异同,同时,他提出在做中日比较研究时,应该把日本、中国汉族、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三者均纳入比较研究的视野,从而扩大跨文化比较对象。

樱井龙彦是最早研究彝族祖先崇拜的学者,在彝族祖先崇拜方面成果丰硕,《彝族的祖先崇拜与他界观》论述了彝族的灵魂观与他界观,指出彝族的祖先送祖灵的山洞,某种意义上依然是一种山中他界观的表现。此外,其他还发表有《彝族的家支制度与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家支得以维持和发展的重要功能,在现代彝族社会依然占据重要地位^①。并且指出祖先崇拜与家支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此外他在对彝族和日本祖先崇拜的比较中,对于祭祖礼仪方面的相似进行了陈述,认为两

者存在着诸多仪式上的共同之处。

受樱井龙彦等彝族研究影响,佐野贤治教授组织中日学者在1994—1996年对四川大凉山的彝族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从比较民俗学的角度研究了彝族的民俗宗教,其《中国西南纳西族彝族的民俗文化——民俗宗教的比较研究》项目就是以大凉山彝族作为调查研究对象,研究纳西族和彝族在祭祖仪式上的相似之处。岗部隆志《死与袂褻——中国少数民族彝族的袂褻礼仪与日本的袂褻之比较研究》,侧重于死亡与污秽观的解析,指出彝族的袂褻污秽的仪式与日本有着相似之处,是因为两者都将死亡视为污秽的来源;工藤隆《中国少数民族与日本文化——探寻古代文学的古层》,将文化人类学与神话学结合起来研究,其中涉及创世神话的部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两者在神话角度而言都有着相似的祖先信仰;斧原孝守的《云南和日本的谷物起源神话》《东亚民间故事比较研究之课题》。其中通过《蛇婚婚姻》探索云南彝族与日本的传承,通过民间故事的视角,挖掘其中的共同之处,两者对于蛇的认知、对于人和蛇的异类婚的观念产生的来源。日本神社的祭史马场纪美史原著《日本文化与彝族文化渊源关系的研究》则更具有代表性,其中的比较角度新颖,内容细致,详细列举了彝族与日本在传统宗教仪式中的各种相似之处,其中涉及时辰、方位、神圣空间建构的神枝神木,更有《古事纪》与彝族创世史诗的比较,并且还从神话角度探寻两者对于世界的认知上找到了共通之处,并由此指出两者存在文化交流的渊源的结论。鹏德昱程的《日本祭史与彝族毕摩》,则通过日本天皇宇佐神功祭史马场纪美先生对彝族传统文化与日本古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揭开了许多古代史之谜,涉及日本的北辰星崇拜、彝族的北斗星崇拜,其中还特别提及日本神社正殿的拜柱和杨桐,并发现彝族作仪式时和日本神社在祭祀时的相似:都有插神枝等共同之处,提供了民俗比较的视角。白鸟方郎则倡导历史民族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从而促使更多的日本学者相信,日本民族文化之根可以从西南彝族中找到启发。随后,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实施,日本学者中尾佐助、佐佐木高明在云南彝族地区田野调查基础上提出了“照叶林文化论”的系统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扩展到物质文化、饮食文化、精神文化等关联与传播的验证。

诸多彝族研究的日本学者在跨文化比较中,角度大多侧重于传统文化中的宗教,常围绕民间信仰和仪式、神话等,多侧重于相似点,主要目标是为日

本文化寻根溯源寻找依据。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彝族这一他者,探明日本民族文化起源,本质上其目标是实现日本的文化自我确立,为日本人论提供依据。但是日本学者方面的研究为彝族研究提供了更宽阔的视野。其中比较的对象涉及神话、传说、祖先崇拜、仪式礼仪、民俗节日、文化地理等,范围广泛。然而其中个案分析、文本等细描较多,且因为其研究所限,聚焦于印证日本文化的根在中国西南彝族,因此在比较研究中以找寻相似为主,较少涉及文化根本差异,而对于思维模式的深层差异几乎没有涉及。虽结论较单一,但视角多元,为西南彝族未来的跨文化比较提供了很多新视角的启发。

二、国内关于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受到日本彝族说影响,国内关于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较成果较多,且视角广泛,其中涉及学术史、宗教、民俗、神话、传说、仪式、译介等,呈现多元化、多视角的特征。

(一)神话、信仰、结合农耕文化特征的比较分析

张正军《文化寻根》不仅总结了日本学者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研究,并比较了冲绳与彝族的创世神话,主要围绕创世诗《梅葛》与日本《古事记》进行比较,研究两者的相似与差异^[4]。黄璨《日本的立山信仰与中国西南地区的彝族山神崇拜的对比研究》^[5]论文中围绕日本立山信仰和彝族山神崇拜,从万物有灵,女性禁忌及山中他界观三个角度进行比较,通过比较看出两者是精神本质相同,但表现不同,而两者异同主要是由于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宗教影响所决定的,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任志睿的《云南彝族与大和民族的古代女性崇拜比较研究——以《梅葛》和《古事记》为中心,针对两个文本比较神话中出现的女性,并分类“大地母亲”、民族始祖、农耕文化与女性三类,比较分析中,发现其相似之处根源于万物有灵信仰以及自然界的母性,两者地理距离相隔甚远,却在文化的某些方面拥有共通性,从而设想两者之间具有某种联系。钱培培《日本諏访神社的“御柱”研究——以亚洲的神树信仰为视角》,一文提及日本諏访神社的4根御柱建在神社的四方,这与四川大凉山彝族的叙事诗《勒俄特依》里开天辟地篇中出现的四根柱子撑起天地的空间感相似。諏访神社的四根柱子勾勒出一个神圣的区域,用于迎接神灵^[6]。傅光宇《阴阳五行在中国彝族农业神祭祀与日本农业神祭祀中之异同》一文中,从阴阳五行思想切入,比较其对中国彝族农业神祭祀

和日本农业神祭祀产生的重大影响。只是,日本农业神祭祀中的阴阳五行观念,受到汉族影响的同时,融入日本民俗,形成“山神与田神——三合原理和农业神的轮回”结构。中国彝族农业神祭祀中的阴阳五行观念,则与上古氏羌文化、中原文化相关,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同时,保持着彝族本身的固有文化特征,显示出与日本农业神祭祀不同的特点。以上研究将彝族、汉族、日本和族纳入了比较对象的领域,同时突出了彝族文化特质。

(二)关注国外研究综述以及文学,以及他者视角形象描述的分析

如赵蕤主要关注于研究综述和译介。此外还有关注于彝族传统宗教的《论彝族、日本民间文学中的道教思想及二者关系》指出彝族和日本民间文学之间关系等。徐晓光则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入手,锁定女儿国神话的比较,其《遥远的“女儿国”神话——中国彝族“女儿国”神话与日本“女儿国”神话的比较》,通过关于女儿国的史料记载进行分析,感生神话的共同之处,关注的是历史的视角中,彝族与日本在父权与母权博弈中的力量差异与最后结局之间的因果关系。姚祎《日本NHK纪录片中的中国少数民族形象》,分析日本这一他者角度下对于《彝族终身大事》的阐释,是对他者视角的重新解读。这部由日本NHK拍摄的少数民族关于彝族终身大事的纪录片极具代表性,其中选择以服饰、建筑等作为民族符号的视角展开,通过这些符号解读彝族民族习俗,建构起了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彝族社会的缩影,其中对彝族社会存在的偏远、经济落后、女性地位低等问题都进行了描述,以与现代社会相对照。针对日本作为“他者”视角对于彝族的解读,是否与真实的彝族社会完全契合,作者提出了新的思考^[7]。

(三)民族节日或民间仪式活动的比较分析

胡媛媛、杨俏村《浅析中国彝族火把节与日本那智火祭》从节日的角度进行异同的比较,揭示节日背后的文化深层内涵,比较的角度涉及神话、民俗节日、宗教信仰等,并侧重从民俗节日的角度进行分析。通过比较体现出两者共同之处,就是人类畏惧火、崇拜火的共同心性,这种心性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表现不同。莫伟龙则另辟蹊径,从民族性格当中“崇武尚勇”的视角展开,从民族体育和现代竞技的角度进行《中国彝族、日本大和民族“格斗”文化审视》,通过比较揭示出两者的共同之处,以及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体育经济发展中的文化价值,主要是通过与他者的比较,找寻两者的共同

之处以及共同价值。在节日的比较中,有诸多使用到影像人类学的方法,也有采用纪录片方式的分析,分析角度和方法都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与早期的田野调查不同,此时的比较研究比较关注通过影像等直观的语言进行表达,其传播范围更广,也隐约可以预见未来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新思路。

三、彝族文化与日本文化跨文化比较的意义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每一种世界性的宗教,都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都有其独有的文化深层。正如国际彝学会的日本学者佐野贤治所叙述的“了解异文化就是了解本文化,并最终认识自我的途径。”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不断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文化之间的交流增多,文化差异凸显,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成为全球化发展中民族文化的重要课题。

跨文化比较的意义在于在比较中参照对象,获取深层次的自我认知,促进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包含认同、比较、反思、批判、创新等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内容。跨文化比较可以使我们获得正确的文化观,避免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自卑感^[8]。

至今为止的研究成果中,彝族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神话、信仰等层面,研究的视角大多是点到线或面到点,即个案研究,或调查报告内的成果较多。虽然有相关比较,但大多较为零散,尚缺乏系统的比较。事实上彝族和日本大和族的确存在诸多相似,首先就是语言,语言结构中的谓语后置相似,重名誉轻生死的英雄情结相似,祖先崇拜的信仰相似等。其次,新年节日祭祖拜祖等节日也有诸多相似。此外,信仰层面,生死观等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分类,也存在诸多相似性。在这些相似性中存在着怎样的共同规律,在差异的部分,又体现了怎样的文化特征。“不同文化并非想象中那样与众不同,却也不是想象中的普遍合一^[9]。”文化普遍性与相对性都是同时并存的。从比较语言学角度,尽管一般语法和句法层面比较上,语言都是不同的,但在更高层次的抽象层面上,所有语言都受到某种根本原则的限制,所以必然有某种共同的思维结构起作用。同样,人类的基本行为也必然具有某种根本结构,而这个基本结构是共通的。列维施特劳斯从神话与礼仪系统对宗教的比较分析亦是如此。因为共同心性和根本结构,所以两者在比较中必然会发现相似点,受到文化寻根的启示,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两者文化也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神话

比较、宗教信仰比较、语法结构比较等等。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有助于借助他者的参照,加深对“自我”的认知,有利于增强文化自觉意识。

日本学者的研究,比较关注的内容之一是关于民族信仰、民族起源的问题。从西南少数民族的主要民族信仰来看,很多与日本民族有相似之处。彝族崇拜自然、动植物、祖先等,他们认为万物皆有灵,特别重视祭祀天神、火神、虎和家族祖先,重视祭祀祖先这一点与日本的盂兰盆节有共同点。民族信仰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系统。民族信仰与每一个社会必须要面对群体团结和道德规范这样的根本问题有密切的关系。不同的社会群体根据其文化的具体特质来实现这些基本的功能。伴随全球化的加速,异文化之间的隔离早已经打破,这种打破不可逆转,倘若为保护本土文化不受外界影响而采取强制隔离,则会衍生“文化窒息”,让文化本身失去活力与生机。“兼容性并存”难以实现,是由于异文化本身的不相容性本质所决定。全球化让各种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变得更为迫切。

四、结语

总而言之,目前关于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内容跨度有民俗节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体育竞技、对外传播等不同方面,但是比较对象往往集中于民间信仰的某个元素、某个细节或某个个案的比较,重于现象相似性的陈述。跨文化比较的方法,主要采用文本文献资料,辅助以田野调查。具体类型神话、相似传说、相同的信仰等角度的比较成果已经具备比较深厚的基础。传统的文献资料运用、结合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已经比较成熟,但是由于主要是文字记载的方式,田野调查中又受到不同区域不同语言的影响,研究结论难免受限。然而,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的主要元素,都会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在自媒体时代,记录生活的方式变得更为便捷。民族的节日、仪式等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影像记录的方法进行记录,影像的记录,结合典籍,以及田野调查、人物访谈等方式,更有助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开展,突破由于地区和方言差异的细小差异,能够深入到文化深层的分析。未来的跨文化研究,预计会出现系统化比较和媒体时代的特征。如果采用影像记录的方式,可以突破语言、地域等障碍,通过“视觉”的语言提供给我们更直观的信息,视觉化语言的运用,在全球化背景下,笔者认为将是未来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手段。

(下转第76页)

量面前,我们选择质量”,“宁愿销量下降,也要保证品质最优”,赢得了很好的市场口碑。因而,经营主体一定要树立“保质量就是保未来”的观念。

2. 应该将提升数量向提升质量转变,通过科技创新,解决资源利用率低以及农业污染问题,培育新型主体,通过标准化、品牌化提升我国农产品的质量^[7]。

3. 在防治病虫害方面,蜂产品经营主体应该考虑引进中医农业(chinese medicine agriculture)作为解决方案,既有助于改善凉山蜂业产量和质量失衡的状况,还有助于消除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顾虑,进而实现蜂产业“优质、高产、高效”的创新型健康发展。

(三)优化设施设备,改善生产效率

效率不是速度,而是更注重在保证和提升生产质量前提下的速度。设施设备的优化是实现标准化生产的基础,也是实现产品质量和效率提升的前提条件。要改善经营主体的产品管理结构,设施设备的改善是必要条件之一。凉山蜂业经营主体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1)通过引进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蜂产品龙头企业投资建设相关设施设备;(2)由养蜂协会牵头,蜂农自愿联合投资,引进先进设施设备,共建共用,并可对外经营;(3)可以通过政府

扶持具备条件和实力的经营主体,实现蜂产品生产加工设施设备升级改造,并以契约形式形成有效的管理和使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凉山蜂产业的公共资源,达到所有经营主体共同受益的目的。

(四)利用优势资源,提升创新能力

创新产品形式、消除蜂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让消费者能够以最直观和简单的方法辨识蜂蜜真伪,同时改善宣传方式,明确产品定位,改进产品定价策略,是凉山蜂蜜赢得市场需求的关键。西昌市教科知局的科技项目“纯天然原生瓶装巢蜜规模化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新产品开发”已经取得明显的科研成果。

科技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有效提升产品质量。创新能力的提升,正是消除产品管理结构失衡的重要途径。凉山蜂产品经营主体要充分利用西昌学院及地方科研机构的人力资源优势,瞄准市场需求,重点解决养殖、生产、加工、存运和营销难题,是消除技术创新与质量目标失衡的简单而有效的途径。在推进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要改善科研组织方式和协作模式,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防止出现科研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努力提高蜂产品生产的科技含量,才能改善供给侧与需求侧结构失衡的现象。

参考文献:

- [1] 赵坤.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综述[J].时代金融,2018(30):25-26.
- [2] 姜长云,杜志雄.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 [3] 宋洪远.关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和建议[J].中国农村经济,2016(10).
- [4] 郭晓鸣.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改什么?[J].农村经济,2017(12):1-5.
- [5] 杨建利,邢骄阳.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6(4).
- [6] 向明生,桂富荣,普雁翔.基于品牌战略导向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8,34(1):79-82.
- [7] 郑风田.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若干问题思考[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12).

(上接第26页)

参考文献:

- [1] 戴维·伊格内修斯.新国家主义[N].华盛顿邮报,2005-04-20;参考消息,2005-04-24.
- [2] 张正军.文化寻根:序言[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 [3] 巴莫阿依,黄建明.国外学者彝学研究文集[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 [4] 张正军.文化寻根——日本学者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9.
- [5] 黄璨.日本的立山信仰与中国西南地区的彝族山神崇拜的对比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6.
- [6] 钱培培.日本諏访神社的“御柱”研究——以亚洲的神树信仰为视角[D].宁波:宁波大学,2012.
- [7] 姚祎.日本NHK纪录片中的中国少数民族形象[J].新闻研究导刊,2016(24).
- [8] 周大鸣.现代都市人类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 [9] 列奥纳多·斯威德勒,保罗·莫泽.全球对话时代的宗教学[M].朱晓红,沈亮,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